

海峽兩岸小說的風貌

蔡源煌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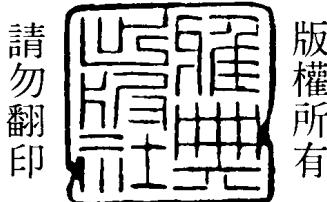
文化研究的方法



海峽兩岸小說的風貌

蔡源煌著

雅典出版社



海峽兩岸小說的風貌

中華民國78年4月 初版

定價——150元

著者 —— 蔡源煌

發行者——辜振德

出版者——雅典出版社

台北郵政10126號信箱

電話396-9041

郵撥 —— 127674-8 辜振德帳戶

印刷——優文印刷廠

登記證——局版登記字第4105號

一九八八年文化體檢：誰是大贏家？

——代序

文化體檢本來就沒有固定的界說，所以本文所述也僅是代表我個人「己之見而已」。好在「年度」是確定的，我們可以就一年中發生的主要文化現象提出觀察。不過，話說回來，這並未使我的工作——本文之寫作——顯得更輕鬆、容易，理由有二：其一，文化並非獨立的範疇，而是與社會中的其他領域相互關聯，甚至產生互動。因此，政治上的開放，議員問政時抗爭的戲劇化、立場的情緒化等等，都會連帶影響到文化意見的盡情發抒。傳播媒體對俗文化的偏好則影響作家創作時題材上的斟酌。其二，文化體質的貧弱，勢必要從根本治療做起，光是檢驗、診察實無濟於事。

一九八八年，台灣各方面的文化，無論是政治文化、經濟文化、或社會文化，均表現出一個一貫的主題：恐慌。「恐慌」這兩個字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解釋——它是指由於某種潛意識的不安而反映在行為上的慌張和非理性。如果要深究「恐慌」這兩個字的深層意義，我們會發現，它隱涵著某種「自殺式的虛無主義」(suicidal nihilism——請參考 Arthur Kroker, David Cook 合著 *The Postmodern Scene* 一書)。那麼，我們又問：自殺式的虛無主義究竟是什麼？虛無主義所代

表的是對於現行體制的不滿與不信，而人們若表現出某種自殺式的衝動，甚至於存著玉石俱焚的用心，那正是恐慌的最佳註解。

舉例說，五二〇事件中，在台北市城中區的街頭對峙與混戰持續了十七個小時，事實證明，其失控的場面，無論是居中協調的民進黨籍議員或鎮暴的軍警，兩方人馬都無法立即有效地加以勸阻。在台灣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從農業社會進到以加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農民所扮演的「過渡角色」和他們的貢獻顯然是被輕忽了。撇開政治因素的羅織不談，在五二〇事件中，農民所要求的，事實上是要社會給與他們一些良心上的回饋。反對美國農產品和火雞肉進口只是五二〇事件的近因、導火線；長期以來，農業政策的失調，農民福利的輕忽等等，這些方是遠因。追根究柢，五二〇事件的恐慌情緒與行動最後還是要農業當局向農民昭示其誠意方得以平息。

早在前年民間風行大家樂的時候，觀察家便已指出民間游資充斥地下市場的隱憂。一九八八年，大家樂改頭換面，走上「國際化」的方向，如今香港六合彩也「本土化」了，其風行不遜於大家樂——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四電話阻塞，而六合彩的組頭儼然有取代村里鄰長之勢，成了地方上的協調聯絡人。

同時，部分的民間游資也轉向股票交易。在股票狂飈的時段，一撈就是幾千萬盈利的說法時有所聞。問題是，大多數的股票新手根本不知道連股票的遊戲規則也只是對「大戶」有利，說得不好聽，它簡直是弱肉強食的野蠻競技。當然，不論大戶或新手，在股票指數狂飈到八千點時所

獲得的「暴」利，是名副其實的「恐慌錢」(panic money)。

六合彩也好，炒股票也好，輸了就淨想著下回如何翻本，一聲也不敢吭，只有在贏了錢的時候才敢大聲張揚，以至於贏錢之說掩蓋了輸家的哀歎。不過，贏了錢也不一定見好就收，到頭來還是要賠回去。總之，這種「恐慌錢」的妙趣無非是要恐慌地賺，恐慌地揮霍，像遭到某種瘟神的詛咒一樣永無竟日。最後，我們不禁納悶：到底誰才是大贏家？答案是：贏錢還是贏錢的人，沒有贏錢命的人就是賠了性命還是贏不了！

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恐慌邏輯」，蔓延到文化界、出版界，則表現出更澈底的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風一吹，彷彿是在告訴大眾說：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屬於永恒、穩定的價值觀，所以寧可圖一時之利，也不在乎什麼文化使命了。於是，譁衆一時，只為取寵；投資出版也只顧眼前的立即利潤。過去所謂「小金剛」型的出版社，小本經營，圖個細水長流，又可表示文化人對文化界的回饋；如今，更多的出版商寧可在「暴利暴投」的大前提下瘋狂地投下資本——就像葉啓田唱紅的那首歌一樣，「愛拚才會贏」！

一九八八年的大陸小說熱，介入的出版社，由新地，而擴大到包括林白、希代、海風……等家。顯而易見的，大陸小說在台灣的市場價值，在一年的狂熱之後，迅速地呈現出疲憊的趨勢。前不久，詩集、論文集已開始出籠，但是我們猜想，那也只是文學熱的剩餘價值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思想、哲學方面大陸出版品的引進。那麼，可想而知的，早先曾出版李澤厚、金觀濤、

嚴家其的谷風出版社，在來年也勢必要面對更多出版社的競爭。

除了大陸小說熱一窩蜂的出版競爭之外，我覺得一九八八年文化界和出版界最盛行的一個名詞，恐怕非「包裝」莫屬了。所謂「包裝」的概念，係來自商品美學，而它的基礎義理乃是將文化、知識視同商品一般來促銷和販賣。

我先談把知識當商品來販賣的現象。事實上，近二、三十年來，台灣的文化發展充分反映了海洋文化性格，吸收了許多來自第一世界和日本的資訊。這種現象，在堅持發揚國粹的保守主義者和固守華夏中心的民族主義者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可是，無論如何，以加工出口為導向的中小企業經濟型態根本容不下一丁點兒門戶關閉的想法。門戶一開，文化方面就免不了一些外來的影響——好的壞的都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從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在台灣完成從小學到大學的完整教育流程而又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的人，開始陸續回國服務。他們的思維語言和思考之架構，深受外國——尤其是歐美——思想浪潮的影響，而社會上也明顯地接受他們的思維語言和認知。勢之所趨，島上對外國資訊的倚賴也逐漸加深。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才有人呼籲要盡量使外來資訊經過創造性的轉化，而後始能談應用。這個轉變多少意味著國內對知識自主化慢慢有了迫切的自覺，否則囫圇吞棗，不中不西，實在很難看出有何大用。更耐人尋味的，自一九八六年九月民進黨的成立獲得默許認定，而後到宣佈解嚴和開放大陸探親以及報禁開放等等措施，益發使資訊的開放、蓬勃和流通成了眼前不可抗拒的事實。如此一來，許多資訊已不復再為少數人所

「壟斷」或專屬。

歷來，知識分子所扮演的批判角色，到了一九八八年，也因國會議員問政的尖銳而有所遞減了。對外的知識倚賴降低，加上國會問政風格的提昇改進，便使得向來享有優勢發言權的海外學人頓然居於「向隅」之境地。當然，晚近幾年的國建會在輿論界一直評價不高，而一九八八年的國建會所遭到的譏評又數歷年之冠。同時，我們也看到對熊玠傳話風波有了客觀公允的貶抑。總之，一九八八年的開放氣氛打破了以往保護敏感或尖銳資訊的瓶頸，而海外資訊在國內「交易」的專賣權，也因「熊玠訊息」的短路而有了重大的改觀。

其次，我們可以談談把出版物當作商品來包裝促銷的現象。當然，這種做法是以「魅力訴求」為基礎。例如，希代出版社的新人小說，在封面設計上，仿照流行歌曲唱片的常規，將作者的彩色照片刊印其上。在書冊的封面上刊印作者的彩色照，加上綺麗的標題，是經營魅力的一種方式，而且也訂定了它們以青少年讀者為訴求對象的方針。

平心而論，包裝、促銷是無可厚非的。我只是擔心一味的包裝與固定讀者群的訴求，會提早使一個作家的角色和創作路線僵化定型。這樣的批評，當事人是否聽得進去，我不知道。

儘管在文化界已有人將希代小說族的新秀稱為「紅脣族作家」，苟同也好、反對也好，都不重要。我並非要為他們說話（況且也沒有人領這個情嘛），不過，我倒覺得有必要指出這個現象的意義。

希代紅層族作家的崛起，至少有兩件事是值得文壇深思的。其一，是關於鑑賞的格調與題材斟酌的問題。我們不可諱言，文藝鑑賞的「格調」、好尚是離不開階級性的（請參考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研究青少年文化的英國學者們則指出，青少年酷愛熱門音樂，是因為在這個「同好」當中，各階層的青少年可以藉此而達到階級觀念的超越——不論出身之貴賤，反正喜好的是同一種音樂。希代作者群在題材上的選擇——例如男女關係的問題——迎合了青少年對他們的「現實」的認知。其二，希代作者的小說是針對「文學作品」的定義之一種抗拒——甚至也可以說是一種挑戰。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文學作品」的認定，最早是根據特定個案加以歸納，而整理出一些特性。就如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是就早期希臘的悲劇、喜劇加以歸納整理。古今中外，長久以來對什麼是「嚴肅的」文學似乎已有了定見，而且代代相承。在西方，自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以來，開始有人（如蘇珊·宋姐）指出，大眾化、通俗化的文學亦應受到「正視」。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來，台灣青少年的問題不僅反映延長國民義務教育為九年以後國中教育的「危機」，而且更具體地暴露出青少年在社會的大染缸裡究竟是生活在什麼樣的現實當中。無疑地，透過外來文化不斷的再教育，時下的青少年對性倫理、工作倫理都有新的看法，而文學大眾化的主要素材——飲食男女——也加速「庸俗化」的脚步。試問：像《蓮漪表妹》、《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看海的日子》那樣的人物造型、生活與憧憬，對眼前的青少年來說，魅力安在？我們刻正需要新的文學典型，希代作者群的作品也許

不是我們所要的最後答案，但是無庸置疑的，文學作品認定的價值標準正在浮動、轉變——這才是根本的事實。

文學價值在轉型期間的浮動，不僅將造成議論或敘述（narrative）體裁的革命，也可能醞釀出不同於以往的感知架構和方式。目前已看到的變化乃是資訊日趨浮泛，而資訊的「區格」也愈來愈小。偏偏自一九八八年一月報禁開放以來，文化副刊分家，助長了綜藝型副刊的五彩繽紛與茁壯，原本幅員遼闊的文化副刊在報紙增張之後，反而更顯得寂寞，甚至沒落了。如今「小耳朵」（直播電視系統）的開放，也勢必使資訊浮泛的現象變本加厲。本來，觀眾從電視新聞上或其他節目上就無法冀望去獲致有相當深度的知識，充其量，觀眾也只是看到炫目矜奇的畫面或人物的肢體語言，至於事實的深層真相，則「目眩浪而亡見」。也許未來的學者將會發現，報紙增張後，文化訊息日漸膚淺短小，電視的炫目型文化造就了華而不實、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社會文化——這些都會影響人們的感知方式，而且一九八八年的變化將是關鍵性的。

文化的茁壯或頽敗，不是少數人的力量有以致之，而要針砭時弊力挽狂瀾，也非得要有全面化制度性的努力不可。可是，歷來，當局在文化方面的施政成績却很難教人樂觀以待。所以眼看著本來就已盛行的檳榔文化在一九八八年也開始講究「包裝」，原已猖獗的啤酒屋更是爭奇鬥妍，在內湖的湖面上伴著湖光山色來招攬食客——這些現象在一般人看來，即使有點「異樣」，耳濡目染久了恐怕在人們的認知裡已經被常態化了。

當然，文化體檢總不能錯過社會上普遍的功利主義。功利主義使人陷入「手段—目的」的僵局：做一件事只是一個手段，它一定另有目的。近在眼前的一個例子是：許曉丹「廻旋夢裡的女人」由於堅持裸體表演的要求，終於如願地成了新聞，近幾天，則有消息說，許氏有意競選立法委員，成爲義大利小白菜在台灣的翻版，而且她承諾，如果當選，她將裸奔內湖垃圾山、裸體跳淡水河。也許是我的錯覺吧，但我總覺得，裸裎是手段，目的則另外去想。

以上我針對一九八八年的文化現象提出我個人的觀察，但是，坦白說，一九八八的熱鬧將是我永生難忘的。我還要說：美哉一九八八，我有幸活在這個年代，親眼目睹了妳所展示的絕代風貌。

蔡源煌

一九八九年一月

蔡源煌著

海峽兩岸小說的風貌

蔡源煌教授曾表示，他並不太喜歡「評論家」這個頭銜，但事實上，他的論述稱為文化評論一點也不為過。本書中蔡教授運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討海峽兩岸的文化及文學現狀，為評論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

本書涉獵文學、意識形態、語言、社會、潛意識，揭露文化現象之本質；一方面對當前台灣社會之功利主義與現實主義提出針砭。另一方面對大陸新時期小說之流派作了精闢的介紹。

雅典出版社鄭重推介

蔡源煌教授另一新著

《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

蔡源煌

台灣嘉義縣人，民國五十九年畢業於台大外文系。一九八一年春季獲得紐約州立大學賓罕頓校園英文系博士學位，主修現代英美文學及文學理論，對當代文學與文化現象涉獵諸多。

作者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講授課程包括：文學批評專題研究、英國文學史、研究方法、現代文學思潮等。著有《寂寞的結》、《文學的信念》、《當代文學論集》和《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等書。

海峽兩岸小說的風貌 目錄

一九八八年文化體檢：誰是大贏家？——代序	一
五四看臺灣文壇——一個理論架構的省察	一
文化趨勢的變遷	一
附錄：正視當代文化	三九
臺灣四十年來的文學與意識形態	四三
從臺北人到撒哈拉的故事	六五
三〇年代的小說	八一
從大陸小說看「真實」的真諦	九七
從「僭越」理論的實踐看大陸新生代小說	一一七
附錄：歇斯底里——評殘雪的《黃泥街》	一四二

現代生命的斷層掃瞄——葉曙明小說評析

一四三

論韓少功的中篇小說《爸爸爸》、《女女女》、《火宅》

一六五

我看大陸小說熱

一九三

五四看臺灣文壇

——一個理論架構的省察

平心而論，五四運動是一個新文化運動，表現於文學方面較晚，而且爭論相當大。從一九一七年算起，前階段是工具革命，重點在白話與文言的爭執，等白話成為國語已是不爭之實以後，文學革命很快的便淪為革命文學。

簡論五四期間的文學理論

從一九一七年到整個卅年代的文學來看，文學爭論中最具代表性的可能是「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之爭。在尚未討論他們之間的爭執前，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必須說明：爭執的雙方都擁抱托爾斯泰。「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抱持托爾斯泰的思想，認為文學應該具有人道主義的關懷，後來茅盾（沈雁冰）才特別強調法國丹納（Taine）在研究英國文學時所提出文學研究的三要素：人種、環境及時代。同樣的，「創造社」成員也擁抱托爾斯泰：郭沫若剛從日本回來時，民國十二年五月二日在上海大學講演〈文藝之社會使命〉，標榜藝術的根是建立在感情上，而感情具有